

◎文学新地理⑬

# 天津文学： 破茧化蝶 多元共生

□ 黄桂元

- 某种意义上，天津文学并非脱胎于天津文化，而是与新中国同步诞生的
- 天津“第三代作家”不习惯于既有文学观念的因袭守旧和小说操作层面的循规蹈矩，其展示艺术个性的欲望远远超过自己的前辈
- 天津文学与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正处在一个由自足、本土转向多元、开放的重要跃升时期

历史上的天津既是毗邻京城的“天子门户”，也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北方移民城市，同时还与上海并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天津市民大多从冀、鲁、皖、晋等地迁徙而来，由此决定了天津文化的复杂构成和走向。某种意义上，天津文学并非脱胎于天津文化，而是与新中国同步诞生的。尽管旧天津也曾演绎过作为北方通俗小说发祥地与出版中心的“盛世繁华”，其流光溢彩的代表人物刘云若、官白羽有“言情、武侠津门两大家”之称，但整体来说还处于一盘散沙、自生自灭的状态，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文学版图。天津文学真正焕发勃勃生机，与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 “解放区文脉”到新时期文学

考察天津文学的前世今生，需要更悠长的历史维度和更宽阔的时间坐标。最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分别举办了孙犁、梁斌、王林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有意味的是，这几位著名作家皆为地道道的河北人，孙犁的《荷花淀》《铁木前传》以及“芸斋小说”和文学随感，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等，已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天津文学与河北文学有部分重叠的事实，其来有自，是历史原因使然。

当代天津文学的溯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伴随着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一批革命作家和进步文化人与各路解放大军同时进城，并“接管”了天津文学界。不算在津短暂工作过的阿英、陈荒煤、周巍峙、郭小川等文艺界领导，小说家孙犁、梁斌、王林、方纪、袁静、雪克（孙振）、柳溪、杨润身等，“七月派”诗人鲁黎、阿垅、芦甸等，多来自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或延安。他们落户天津后，以反映革命战争岁月为己任，支撑起“解放区文脉”并辐射全国，天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成为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风水宝地”。以他们为主体，加上有中国现代派诗歌奠基者之称的“九叶派”著名诗人穆旦、域外驰名的世界语诗人苏阿芒、归侨小说家高云览等，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构成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第一代作家”，形成了一道特殊的文学风景线。

天津文学得以“破茧化蝶”，聚集起声势日壮的地域文学方阵，



冯骥才



林希



蒋子龙



赵致



尹学芸



王松

还是源于新时期中国文学大潮带来的时代契机。

## 承前启后的现实主义景观

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来，一批老作家劫后重生，纷纷复出的同时，继往开来的“天津第二代作家”也在迅猛崛起。他们既有对宏大叙事的依托和驾驭，也有对具体人性的描摹和勾勒；既有对遥远历史的虚构和想象，也有对现实问题的针砭和追问，为天津文学的破茧化蝶和蓬勃发展起到了某种拓荒作用，其中的领军人物是蒋子龙与冯骥才。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拜年》《燕赵悲歌》《农民帝国》等小说开一代风气，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改革文学中的“旗手”地位，其雄奇硬朗、铁马金戈的叙事风格独树一帜，深具影响力。冯骥才最初以“伤痕”小说《铺花的歧路》崭露头角，先后参与《新时期》《文学》《天津》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并长期致力于描写天津清末民初市井百态，《神鞭》《三寸金莲》以及《俗世奇人》系列独辟蹊径，宝刀不老。航鹰游走于文学主潮边缘，雅俗兼备，其《金鹿》《明姑娘》《东方女性》《前妻》等小说多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能在短短几年描绘出一片自成气候的小说风景，值得称道。“弃诗从文”的林希厚积薄发，潜心打磨出《买办之家》《相士无非子》《小的儿》《高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提高了“津味”小说的海拔高度和地域影

响指数。杨显惠每年都要风尘仆仆地返回甘肃老家打捞历史遗迹，《夹边沟记事》与《西孤儿院纪事》以扎实的白描内功展示了罕见的思想厚度和人性深度。鲍昌的《芟茅草》《庚子风云》、吴若洋的“蔡庄”系列、王家斌的“海洋”系列、汤吉夫的“高校”系列等作品，丰富了“后文革”时代的天津文学的库存。他们未必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土著”，但其成长背景、人生经验、师承借鉴和文学观念，或多或少都与天津这座城市有着剪不断的复杂关联。

## 锐意探索的多元化格局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赵致、肖克凡、王松、李治邦、李唯、李晶、60年代出生的武歆、龙一、尹学芸、秦岭、狄青等“第三代作家”不习惯于既有文学观念的因袭守旧和小说操作层面的循规蹈矩，其展示艺术个性的欲望远远超过自己的前辈，并已经具备了精英写作的潜质。

对于赵致而言，形式往往也是内容，无论是反映都市知识女性的《朗园》《秋天死于冬季》，还是取材于古代历史人物的“唐宫三部曲”（《武则天》《上官婉儿》《高阳公主》），皆显示出摇曳多姿、辨识度极强的文本风采。如何从旧工业小说模式中突围，一直是肖克凡小说的探索要义，《最后一座工厂》描写了经济转轨中的“国企”命运，《机器》《生铁开花》则为一座老工业城市的历史变迁做了精彩的文学记录。王松深谙小说叙事精

义而别具寓意，《红彗》《红风筝》多层次切入“文革”叙事，《双驴记》等后知青小说则深刻展示出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和人性扭曲。李治邦的《暗示》《巴黎老佛爷店》等小说，融故事与风俗、味道于一体，精妙点染出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当代流行生活。

武歆为寻求小说叙事创新之门的始终锲而不舍，《陕北往事》《延安爱情》《归故乡》的故事发生在大时代的缝隙、大洪流的边缘、大背景的角落，视角“诡异”，意味隽永，拓展了另一种叙事空间和可能性。龙一进入隐秘而惊悚的历史事件书写，一向从容不迫，别有兴致，《长征食谱》是对长征叙事举重若轻的大胆想象，《潜伏》则是对红色谍报题材的诱人探索。尹学芸近期异军突起，风姿绰约，举凡底层疾苦、官场生态与知识分子纷争等社会景观尽在笔端，《土别十年》《李海叔叔》《天堂向左》等作品表明，她已经找到了独特的小说叙事之魂。秦岭个性化的小说叙事极具当代性和现实感，《皇粮钟》《吼水》《天上的后窗口》活色生香，野趣横生，在展示西部风情画卷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乡村现状的迷茫与痛思。

散文随笔与诗歌写作在多元化的天津文学格局中别具风光。孙犁作为当代散文随笔大家有口皆碑，此后，蒋子龙、冯骥才、谢大光、贾宝泉、冯景元、任芙蓉、肖克凡、武歆、周凡楷、狄青、秦岭等新老作家笔耕不辍，风生水起，已形成题旨纷呈、千姿百态的写作群落，活跃于全国各类报刊。他们未必以书写天津风土见长，却在建造各自的散文随笔家园中而各显身手。

鲁黎明年屡有诗作问世，林希写出泣血之作《无名河》。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流浪的恒星》《三月的永生》、徐江的《杂诗事》等，由于分别介入历史反思、灵魂拷问和伦理维度，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诗学魅力，为当代中国诗史增添了值得书写的一页。

就整体而言，作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一方重镇，天津文学与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正处在一个由自足、本土转向多元、开放的重要跃升时期，机遇之神与希望之光并存，它的未来无疑充满了令世人期待的悬念和魅力。

（作者系天津作协副主席）

□ 古帮

# 诗性智慧与诗意生存 ——读王充闾《诗外文章》

◎ 新作评介

显然同少年时代接受的8年私塾教育有关，在王充闾的创作和学术世界里，中国古典诗歌不仅作为一种资源、一种营养，如水中盐、花中蜜般构成了作家大量散文作品重要的审美特点与叙述风度；也作为一种媒介、一种题材，直接催生出入若千顾见精思与高情的诗性著作。

王充闾的新作《诗外文章》是作家与古典诗歌一路同行，别裁风雅、厚积薄发的新著。全书包括诗、文两部分。诗的部分由作家遴选自先秦至近代的各类哲理诗270余家、近500首，是一部眼光独特的古代哲理诗选本。作家将哲理诗巧妙地定义为一种诗性智慧，即一种将理性元素注入形象思维、感性体验、直觉领悟以及睿智修辞的艺术表达。这种理念不仅使入选的哲理诗同某些人“理障”“理窟”的玄言诗、道学诗划清了界限，而且很自然地超越了诗歌划分的种种藩篱、矛盾与盲区，在“理”与“趣”互渗互补的意义上统摄古今以来，普照大千世界。

《诗外文章》在选诗之外，还搭配撰写有鉴赏文章。作家追求“诗文合璧”“借树开花”——“依托哲理诗的古树，开放文化散文的新花。”由此可见，文化散文才是《诗外文章》的核心内容。

书中散文对古代哲理诗的分析赏析评持守“凡为文当以意为主”的古训，将充沛的文心与才情倾注于诗作的题旨发掘与意蕴阐释，文学、历史、哲学构成了三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维度。

就文学维度而言，作家抓住“诗无达诂”这一现象，着重梳理和揭示诗作的原义和衍生义，力求透过多维多向的审美探照，尽可能地拓展和丰富作品的意义承载。其方法和路径大致凡四：一是把作品置于立体开放的阅读空间，引入不同论者在不同语境下做出的不同解读，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态度，加以辨析、估衡和扬弃、取舍，从而实现作品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意义增值与精神出新。如《伊人宛在水之湄》《沧浪之水》《一诗三解》等。二是开启作家自己的认知与想象，对作品进行苏东坡“八面受敌”式的考察与体味，“每次作一意求之”，形成自己的发现与见解，以此不断充实、拓展和丰富其内在意蕴。如《倦人罔极》《此心自在悠然》《原来不过如此》等。三是或联系诗人的心路历程，或比较诗坛的同类创作，在不同坐标下阐发诗作的意味与主旨，凸显其个性所在与价值所藏，同时深化所涉及的哲思主题。如《境由心造》《与邻为善》《让千里马跑起来》等。四是敞开心扉，会通中西，运用马克思主义等观点，阐释哲理命题，彰显其跨文化的精神。如《异化劳动的成果》《社会新变的期待》《诗话沧桑》《“第一个历史活动”》等。广征博引，万取一收，发散性哲学思维使全书的整体风格趋于博雅、睿智、隽永，更增添了一种奇崛、恣肆、尺幅万里的美感。

在品评古代哲理诗时，浸透了作家的历史意识与纵向视角。《一曲自怜自叹的哀歌》《看得见的沧桑》《史眼》《读史写史者戒》《尽信书不如无书》《论史者戒》等数十篇作品，都是针对咏史怀古类哲理诗有感而发，从而构成了“因史生文”的主题。这些作品或探寻并强调历史的固有规律，以此否定历史虚无主义和简单机械的历史循环论；或考察并揭示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偶然性，尽可能地逼近其本真状态。其中最见匠心与功力的，当属作家从“事是风云人是月”



王充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的一贯主张出发，对历史中人之命运、境遇和心态的钩沉与剖析。这样一种艺术取向，不仅折射出作家特有的“六经皆史”的治学理念，而且作为作品增加了珍贵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重量。在浅阅读、轻阅读、碎片化阅读流行的今天，无疑具有抱朴守正、补偏救弊的意义。

《诗外文章》对哲学意味的营造和追求是一道风景。《主客二分》围绕苏东坡著名的《琴诗》展开笔墨，内中所讲琴手相协，方成妙音的道理，阐明生命实践的主客统一。《各有各的活法》品味袁枚的《咏苔二首》，“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境界呼唤对平凡的尊重。如果说以上作品只是对人生某一侧面或某种质素的哲学探照，那么《弱者避世之言》《鸚鵡能言的下场》《人生境界》《无谓的抗争》等篇，则从大处着眼，辩证地分析了人生的进与退、得与失、有用与无用、成功与失败等。作家激赏庄子的逍遥与洒脱，但不曾因此就否定儒家的责任和担当。《英雄中的诗人》《老有所为》《斗士丰姿》等篇，自有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久久回旋。所有这些，交相辉映，幻化为儒道结合的心灵基调与艺术空间，从而体现出典型的传统智慧与中国哲思。惟其如此，我们说，诗性智慧与诗意生存应当是《诗外文章》的关键词。

# 大拙朴与大睿智

□ 凸凹

的。巧写可以写出好诗，硬写也可以写出好诗。印子君的大部分诗，属巧写的一类。

《身体里的故乡》是印子君20年诗歌生涯的作品选，分为“锦瑟”“琴瑟”“心瑟”“目瑟”“年瑟”5辑，收入232首诗作。除了完成于2014年的《今夜，我带你去丹麦》，我更喜欢印子君早期《我眼里的夜色被你叫醒》《镜》《一棵松树与一只松鼠》这一类作品。它们有一种未被网络尤其微信污染，骚扰的宁静、深沉和对至难诗艺的层层叩访与抽丝剥茧。

就文字中显出的智识而言，诗人要么有才华，要么有童心，中间地带不属于诗人。两极呈现出的诗象，按说是相背的、迥异的，但事实非但不是这样，还正好相反。朝两个看似相反方向写出的诗，恰恰有着同一向度。要弄清、醒悟这个道理，读《石经寺遇雪》就可以了。你可以说它是天才的高深偈语，也可以说它是小孩子的天真独喃。但这就是

诗，就是好诗。小童心中窝藏的大拙朴，是印子君的不二杀手锏。“龙泉山把一座古寺/藏得这么深，也被雪找到了。我跨进大院”属于创意设定。设定完成后，随着几个含有双关意味的文化语汇——“皈依佛门”“招人喜欢”“投错了庙”的渐进与转折，诗趋于完成。我个人一点小小的看法是，如果去掉最后两句“在神面前，我必须承认/自己六根不净”，让“投错了庙”成为结语，这首诗会更干净、空灵和余味无穷。诗歌可以不总结，不下结论，不把一条路走到尽头。

印子君是位低调、纯粹的诗人。他一直被他诗带着在走。最后再来说说他用书名的一首诗《身体里的故乡》。指认故乡的方式很多，印子君用的是体认。他避开了大词、颂词和形而上之思，直接让故乡在掌纹、头发和左右手的内移中附着，并向读者溢出一个个还乡者身体的气息。把故乡锁进身体，这种爱，是秘密的深情。

# 呼唤更多儿童文学精品

□ 本报记者 张鹏禹

12月4日，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2018年暨原创儿童文学发展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刘海栖、李利芳、沈石溪、张晓楠、纳纳、徐鲁、徐德霞、董宏猷、薛涛、薛卫民等就委员会工作进行了总结，并与特约嘉宾就儿童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讨。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指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同行，我们应重视当前儿童文学创作能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精神需要，担起“育新人”的使命。怎样在新时代回应、满足少年儿童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命题，应进一步做好儿童文学的理论和批评工作，发挥对创作的指导作用。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认为，要尤其重视、提升原创图画书的质量。图画书能表现孩子目光中的惊喜、惊叹乃至惊艳，色彩线条和语言文字的有机结合是“给眼睛的恩赐”。

特邀嘉宾、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金波以《幼儿文学的特殊性》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幼年记忆是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在创作中如何准确地反映幼儿的年龄、心理特征是一个重要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曹文轩认为，幻想类作品同样需要扎实的写实功底，鼓励年轻作家从写实入手，练好基本功。曹文轩认为，相比于想象力，记忆力对一个作家更为重要，生活提供给作家的素材不是想象力能够比肩的。

上海作协副主席秦文君表示，越来越多的作家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创意投入到幼儿文学创作中，非常难得。近年来，幼儿文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一些作家的创作过于生活化、类型化，缺乏文学艺术层面的打磨和加工。儿童文学要讲究“腔调”，要有沉甸甸的现实感以及打动人心的光芒。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认为，儿

童文学的发展与法规政策、儿童观和儿童教育等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应当看到幼儿文学与幼儿教育之间的紧密关系，幼儿文学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幼儿教育。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儿童文学出版中心总监徐德霞认为，青年作家在注重长篇小说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短篇小说，老作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从短篇入手下功夫，更能使创作贴近生活。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认为，低幼图书出版繁荣，版权输出活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的教育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和数额日益加大。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院院长方卫平认为，利用交叉学科打开儿童文学的“学术之眼”，对推进儿童文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相关从业者意识到理论和理论素养的重要性。

特邀专家王蕾、王志宏、杜传坤、刘颖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